

从全面去合法性到选择性嵌入： 冷战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 态度变迁及其解释^{*}

张春满

内容提要：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和崛起型国家，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突出反映在其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上。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文化主义均不能全面地解释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文章运用话语分析和模糊集合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正在从全面去合法性向选择性嵌入的方向转变。对于这一历史性转变，文章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的理论框架进行解释。冷战结束初期，中国更多地依靠弱者的武器；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综合使用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

关 键 词：国际秩序 全面去合法性 选择性嵌入 话语分析 模糊集合分析

作者简介：张春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其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对此，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复杂的。国际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有三：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本文重点关注和分析第三个问题，并使用话语分析和模糊集合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研究发现，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正在从全面去合法性向选择

* 感谢《当代亚太》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性嵌入的方向转变。针对这一历史性转变，本文提出了“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这一理论框架进行解释。

一、文献综述

中国的和平发展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吸引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当前学术界主要从四个视角来研究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即现实主义视角、制度主义视角、建构主义视角和文化主义视角。前三种视角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科的主流理论路径，文化主义视角是一种新的研究路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创新。

1. 现实主义视角

现实主义研究视角根基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分析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方面，代表性的现实主义视角是权力转移理论和大国政治悲剧理论。^① 现实主义者对中国崛起的影响持悲观态度。例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就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中国发展的担忧。他曾经写到：“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其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那么我能想到的场景将不会很乐观。事实上，这个场景应该是令人失望的。我希望我能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前景持乐观态度，但是，国际政治将永远是混乱和危险的游戏。当一个霸权国在欧亚大陆出现的时候，安全竞争就会变得不可避免。”^② 本文认为，现实主义视角存在两个主要问题。首先，这一视角突出强调了崛起国对国际秩序的挑战，但它却没有正面回应和解释，当崛起国的发展依赖于这一体系的时候，其挑战现有秩序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其次，它也无法解释在什么情况下崛起国对当前的国际秩序是满意的，在什么情况下是不满意的。

2. (自由) 制度主义视角

(自由) 制度主义视角集中分析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日益活跃的发展态势

^① 参见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Tammen and Kugler,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② John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4, 2010, p. 396.

及其影响。^① 典型的国际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SCO）、二十国集团（G20）、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参与国际组织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一点在冷战结束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根据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研究，到1996年，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就已经接近美国的70%，印度的80%和世界平均水平的180%。^② 与现实主义视角相比，制度主义视角对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关系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制度主义者也承认中国的崛起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他们会关心，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否会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否会遵守国际社会的准则和规范，等等。从这个角度讲，他们与现实主义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通过研究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表现，他们发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尊重已经签订或批准的协议的，特别是在贸易、军控、环保和人权等领域。^③ 但事实上，国际关系学者发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经常使用多种策略，包括跟随、平衡、阻挡和创新等。所以，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要比制度主义者认为的更加复杂。

3. 建构主义视角

建构主义视角（包括英国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与国际规范（international norms）之间的关系，其侧重点是中国与人权、中国与国家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主权与人道主义干预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等方面。^④ 建构主义学者对中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看法是复杂多样的。以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即便

^① Michael Fullilove,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takeholder Spectru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11;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Asia Report No. 166, April 17, 2009; Tong Qi, “China’s First Decade Experience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Practice and Prospect”,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Vol. 7, No. 1, 2012, pp. 143-180.

^② 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5页。

^③ Gerald Chan, *China’s Compliance in Global Affairs: Trade, Arms Contro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uman Right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④ Qin Yaq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Process: Institutions, Identities,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2, 2010, pp. 129-153; 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1, 2010, pp. 5-36; Foot and Walt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 Or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可能，也将是非常艰难的。^① 原因在于，要想被国际社会接纳，中国必须首先接受国际社会的主要制度，特别是有关人权、民主和人道主义干预的制度。但是，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这些制度之间存在背离。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不会一帆风顺。其他一些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例如，秦亚青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其中各种关系相互交织在一起，行动者的身份处于不断建构和被重新建构之中。这一过程不仅会伴随着国际社会特征的变化，也会导致行动者的身份发生变化。^②

与现实主义不同，建构主义者对中国崛起的走向并不是非常确定。他们认为，中国可能会固守自身的身份认同并抵制国际秩序，也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接受国际秩序。本文认为，建构主义的这种理论模糊性削弱了其解释力。这是因为，尽管建构主义者关注了国际政治中的互动和社会化过程，但他们忽视了对中国自身身份定位的研究。本文认为，中国对自身现在和未来的身份认知和定位，是理解其与其他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互动的重要基础。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建构主义者将不能更好地分析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建构主义视角的另一个缺点，是它的一些分析范畴有时过于狭窄因而不能提供全面的评测体系。例如，我们不能从中国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态度中，得出中国对国际秩序普遍的认知和看法。

4. 文化主义视角

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西方的理论路径。在过去的五年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解中国对国际秩序态度的研究路径，表现为一些中国学者和部分国外学者以中国的历史、传统哲学、概念、道德和文化作为知识素材和方法论资源，来研究当代国际关系和中国与世界关系，本文将这一视角称为文化主义视角。^③ 文化主义视角与上述三种视角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均有

^① Qin Yaq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Process: Institutions, Identities,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p. 130.

^② Ibid., p. 152.

^③ 文化主义路径的代表作品参见阎学通、徐进：《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Allan Carlson, “Moving beyond Sovereignty? A Brief Consideration of Recent Changes in China’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Emergence of the Tianxia Concep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0, Issue 68, 2011, pp. 89-102; Jeremy Paltiel, “Constructing Global Ord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an Xuetong and the Pre-Qin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Anarch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No. 4, 2011, pp. 375-403。

不同。例如，一些学者、尤其是以国学通为首的“清华学派”，侧重于以中国古代国家间思想和历史作为研究素材，来分析当前的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

在理论创新和发展方面，中国学者对“天下体系”概念的阐释特别引人注目。^①这一理论体系不仅是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工具，更是建设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基石。秦亚青认为，“天下”和“朝贡体系”均应得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认可。这些理论所体现出的整体世界观（holistic world view）与西方的二元对立观（dualistic view）是不同的。^② 加拿大学者包天民（Jeremy Paltiel）持类似看法。他认为，赵汀阳的“天下体系”概念对西方思想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构成了挑战，其哲学路径是对康德“永久和平论”的一种回应，是对西方社会科学和哲学习惯中“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的调整。^③

本文认为，从文化主义视角来分析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但这并非最理想的视角。这是因为，天下体系和朝贡体系所依赖的国际环境与当今的国际格局不同，因此，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会导致其解释力有限。此外，传统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目前并没有相应的数据和资料来验证。鉴于这些不确定性，本文没有采用文化主义视角，而是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路径来分析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

二、研究方法

方法的创新会推动研究的创新。本文综合运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和模糊集合分析（fuzzy-set analysis）方法来研究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

1. 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是一种对相互联系的文本或讲话进行分析的方法。^④ 话语分析

^① 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② Qin Yaqing, “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Vol. 7, No. 3, August 2007, pp. 313-340.

^③ Jeremy Paltiel, “Constructing Global Ord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an Xuetong and the Pre-Qin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Anarchy”, p. 382.

^④ Zellig Harris, “Discourse Analysis”, *Language*, Vol. 28, No. 1, 1952, p. 1.

最初是语言学领域的分析方法，后来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话语分析被应用到政治分析中，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政治研究，并延续至今，且扩展到其他政治学分支领域。伊莎贝拉·费尔克拉夫 (Isabela Fairclough) 和诺曼·费尔克拉夫 (Norman Fairclough) 认为，目前的政治话语分析中有两种比较成熟的路径：一种是保罗·奇尔顿 (Paul Chilton) 的路径，另一种是鲁思·沃达卡 (Ruth Wodak) 的路径。^① 奇尔顿的路径直接传承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关于语言和政治关系的论断，沃达卡的路径则与之不同，后者也被称为话语—历史路径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伊莎贝拉·费尔克拉夫和诺曼·费尔克拉夫评论道，在话语—历史路径中，政治领域被分割到一些行动域 (fields of action) 之中。这些行动域包括立法过程、观点、意图，政党间的态度、观点和意图，国际关系组织，政治广告，政治执行和行政，政治控制。每一个行动域都与一组独特的政治次类型 (political sub-genre) 相关联。^② 本文采用沃达卡的分析路径。

托恩·梵迪克 (Teun Van Dijk) 专门写了一篇详尽的论文来指导如何进行政治话语分析。^③ 在梵迪克看来，政治话语分析主要是对“地方层面、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政治家或政治制度的讲话和文本的分析，例如，对总统、部长和其他政府人员讲话的分析，对国会或政党文本的分析”。^④ 他认为，政治话语分析主要研究话语结构的不同维度，包括主题、上层建筑（或者文本大纲）、本土语言、词汇、句法、修辞、表达结构、演讲动作及互动形式。本文将利用梵迪克的分析框架，对 1992~2012 年间中国共产党历届党代会报告进行分析。本文认为，这些党代会报告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

2. 模糊集合分析

模糊集合的逻辑是要在规则模糊的论证体系中表达不确定性。模糊集合的结论不是要体现正确或者错误，而是要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的正确或者错误。在模糊集合中，确定性的程度被称为“真值”(true value)。模糊集合

^① Isabela Fairclough and Norman Fairclough,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Method for Advanced Students*,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20-21.

^② Ibid. , p. 21.

^③ Teun A. Van Dijk, “What is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Belg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Vol. 11, Issue 1, 1997, pp. 11-52.

^④ Ibid. , p. 12.

理论使用 0 到 1 之间的定距数据：

错误：真值=0；

正确：真值=1；

不确定性（介于错误和正确之间）： $0 < \text{真值} < 1$ 。^①

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进一步发展了模糊集合法，使其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性更强。^② 拉金的努力使得模糊集合分析方法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2005 年，加里·格尔茨（Gary Goertz）和詹姆斯·马洪尼（James Mahoney）通过把双层理论和模糊集合分析结合起来，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③ 本文将运用格尔茨和马洪尼的分析框架，同时将其与梵迪克的话语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分析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

模糊集合法的出现有着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在社会科学界，学者对概念的讨论往往是从二元法出发。例如，对政体的讨论使用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分类法，对国际政治中国家的讨论使用维持现状的国家（status quo power）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的二元分类法。本文认为，这些二元分类法虽然简洁明了，但有时却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以政体的讨论为例。第三波民主化之后，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国家：它们既不符合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标准，也不是专制国家。对于这些国家，使用体现等级差异（graded）的模糊集合分析比较恰当。

当前有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讨论，主要使用了维持现状的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的二元分类法。^④ 笔者认为，这种二元分类法并不能帮助我们很好地

^① William A. Treadwell, “Fuzzy Set Theory Move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55, No. 1, 1995, p. 93.

^② 更多信息参见 <http://www.u.arizona.edu/~cragin/fsQCA/>; Charles Ragin, *Fuzzy-Set Soci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③ Gary Goertz and James Mahoney, “Two-Level Theories and Fuzzy-Set Analysi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33, No. 4, 2005, pp. 497-538. 该文的中文版已由作者翻译发表，参见高奇琦主编：《比较政治学前沿：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第 1 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6~159 页。

^④ Scott L. Kastn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Vol. 56, Issue 1, 2012, pp. 163-177; Feng Huiyun, “Is China a Revisionist Powe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Issue 3, 2009, pp. 313-334; Alastair I.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Issue 4, 2003, pp. 5-56; Katherine Combes, “Between Revisionism and Status Quo: China in International Regimes. China’s behaviour in the global trade, non-prolife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imes”, *POLIS Journal*, Vol. 6, Winter 2011/2012, pp. 1-37.

理解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正如兰德尔·施韦勒 (Randall Schweller) 和蒲晓宇所主张的那样，在多极和两极体系中，均势是维持现状最主要的机制，但在单极体系下，均势就变成了对现状的修正。^① 目前的国际体系是一超多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推行均势的努力，不论动机如何，都会被定义为修正主义。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在很多情况下，一国会试图调整部分国际秩序，但是会对其他部分予以维护，这种复杂性也是二元法无法解决的。使用模糊集合法来分析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能克服上述问题。

三、冷战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

在本部分，笔者拟使用政治话语分析和模糊集合分析方法，研究 1992~2012 年间中国共产党历届党代会报告中涉及国际关系的内容。本文认为，在中国所有的政府文件中，这些党代会报告最能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这是因为，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图、对形势的判断和政策走向决定了中国对内对外的态度和行为。通过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正在从全面去合法性 (general delegitimation) 向选择性嵌入 (selective embedment) 转变。

1. 对中国共产党党代会报告的政治话语分析

尽管名称不同，但是历届党代会报告中都包含国际关系部分。下文将对这些内容进行话语分析。如前所述，梵迪克的话语分析包括八个方面，本文仅选取其中的两个方面——文本大纲和词汇——进行分析，并将党代会报告中的国际关系部分分为四个方面：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政治秩序、国际合作和国际体系。这四个方面能够反映出中国对国际秩序态度的变化。

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能够反映出其对国际经济规则、规范、原则和机制的认知、感受和接受程度，它涵盖了中国对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南北差距、能源、全球化及经济类非传统安全等方面的态度。中国对国际政治秩序的态度能够反映出其对国际政治规则、规范、原则和机制的认知、感受和接受程度，它涵盖了中国对国际安全、地区安全、大国政治、政治类非传统安全、干预及霸权等方面的态度。中国对国际合作的态度能够

^① Randall Schweller and Xiaoyu Pu,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 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1, 2011, p. 44.

反映出其对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的认知和感受，这里的国际合作包括地区合作（主要是亚洲地区）和全球合作。在地区合作层面，包括中国与邻国的合作及与地区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10+3”机制、亚欧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等）的合作程度。在全球合作层面，包括中国与霸权国、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合作程度。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能够反映出其对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和实力安排的接受程度，包括中国对国际体系中的极化、正义性和发展前景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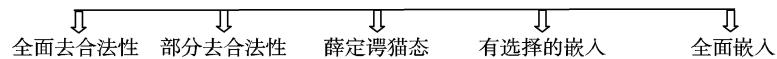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谱系

一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是复杂和可变的。最左边的状态是全面去合法性，它表明一国对整个国际秩序持否定、批判甚至敌视的态度，其与国际社会的对抗行为较多，合作行为虽然存在，但是较少。最右边的状态是全面嵌入，它表明一国对整个国际秩序持肯定、支持甚至强化的态度，其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行为较多，对抗行为虽然存在，但是很少。在这两种状态之外，一国对国际社会的态度还可以被归类为部分去合法性、薛定谔猫^①态和有选择的嵌入。需要指出的是，一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并不必然从全面去合法性向全面嵌入转变，这里并不存在线性发展的关系。

通过对党代会报告的文本大纲分析，本文发现，在1992年的十四大报告中，中国认为当时的国际秩序在四个方面均缺乏合法性。换句话说，中国并不认可当时的国际秩序。这种情况在十五大召开时出现了一些变化。变化最先发生在国际合作部分。在十五大召开之际，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合作的态度开始好转。之后，对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200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对国际政治秩序的态度是最后发生变化的。在之前的四次党代会报告中，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政治秩序的态度都是去合法性。但是，2012年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显示，这一领域也在经历转变（见表1）。

^① 薛定谔猫（Schrödinger's Cat）是由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于1935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本文用它来指代一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处于去合法性与嵌入的叠加态。

表 1 中国对国际秩序四个方面的态度变化

报告/方面	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政治秩序	国际合作	国际体系
十四大	去合法性	去合法性	去合法性	去合法性
十五大	去合法性	去合法性	转变中	去合法性
十六大	转变中	去合法性	嵌入	转变中
十七大	转变中	去合法性	嵌入	转变中
十八大	嵌入	转变中	嵌入	转变中

通过对党代会报告的词汇分析，本文发现，在十四大报告中，表达对国际秩序去合法性含义的词汇数量是表达嵌入含义的词汇数量的两倍多。之后，这一比例开始逐次下降。在十七大报告中，表达对国际秩序嵌入含义的词汇首次超过去合法性含义的词汇。而到了十八大，这一差距变得更加明显（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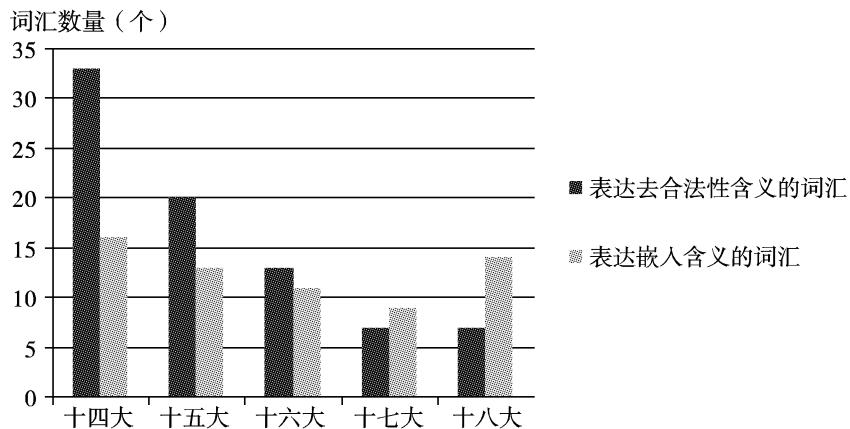


图 2 对第十四~十八次党代会报告的词汇分析

词汇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新词分析。在十五大报告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词汇和主张。例如，“各种区域性、洲际性的合作组织空前活跃”；“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在十六大报告中，新出现的词汇和主张也比较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在十七大报告中，新出现的词汇和主张非常多，例如，“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我们将继续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加强人

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团体对外交往”。在十八大报告中，新出现的词汇和主张主要包括：“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通过文本大纲和词汇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在过去的 20 年中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按照图 1 所示的态度谱系，在十四大召开时，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非常接近全面去合法性，这表明当时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府对 20 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国际秩序持否定和敌视态度。中国虽然与国际社会也存在合作，但是其与当时的国际社会冲突和对抗行为比较多。到 2012 年十八大召开时，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转变为有选择的嵌入。在一些领域，中国支持甚至希望强化既有的国际秩序，但在另一些领域，中国仍然持否定和模糊的态度。

2. 对中国共产党党代会报告的模糊集合分析

在本部分，笔者将使用格尔茨和马洪尼的双层理论对党代会报告进行模糊集合分析，以此来支持上文话语分析的结论。首先，本文需要对研究的自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确认和赋值。本研究的结果变量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

基础层：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

辅助层：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中国对国际政治秩序的态度、中国对国际合作的态度和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

真值：“1”表示“嵌入”，“0”表示“去合法性”。

因为在本文中基础层与辅助层是构成关系，所以辅助层的四个变量是自变量。本文将对这四个自变量进行时间序列赋值，并且计算每个变量的最终模糊值。最终模糊值代表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在 0~1 区间的位置。如果模糊值接近 1，说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是全面嵌入；如果模糊值接近 0，则说明是全面去合法性。

与格尔茨和马洪尼一样，本文采用五值赋值法：0.00, 0.25, 0.50, 0.75, 1.00。对每一个自变量的时间序列赋值是根据对党代会报告的比较分析（与话语分析的材料保持一致）确定的。本文使用 $(\sum X_i, 1)$ 集合法

来计算结果变量的模糊值，计算结果见表 2。

表 2 中国对国际秩序态度的模糊集合分析 (1992~2012)

时间	辅助层				基础层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
	国经	国政	合作	体系	
1992	0.25	0.00	0.25	0.00	0.13
1997	0.25	0.25	0.25	0.25	0.25
2002	0.50	0.25	0.50	0.50	0.44
2007	0.75	0.25	0.75	0.50	0.56
2012	1.00	0.50	0.75	0.50	0.69

注：表中“国经”代表国际经济秩序，“国政”代表国际政治秩序，“合作”代表国际合作，“体系”代表国际体系。

表 2 定量地展示出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在 1992 年，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的模糊值为 0.13，而到了 2012 年，这一数值已经上升到了 0.69。这表明，中国总体上已经摒弃了对国际秩序的去合法性倾向，而是倾向于嵌入到既有的国际秩序之中。但是，中国嵌入国际秩序的形态是有选择的、部分的，而不是全面的。模糊集合分析的结果支持了前文的话语分析结论。

四、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一个解释框架

本文所要研究的首要问题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前文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在本部分，笔者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态度变迁？为什么一个国家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会发生转变？国际秩序一直被西方国家主宰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改变，但中国为什么不再像 20 世纪 90 年代初那样对国际秩序持敌视态度，而是转而倾向于嵌入到既有的国际秩序之中？与之相关联且同样令人费解的问题还有，为什么中国在一些领域与西方国家合作，在其他一些领域却采取与西方国家不合作的策略和行为？

西方学者往往只关注了短期内或者部分领域中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所以其理论解释往往有时空局限性。例如，美国学者爱德华·斯坦菲尔德 (Edward S. Steinfeld) 的制度外包 (institutional outsourcing) 理论只是解释了为何中国在经济领域与国际秩序呈现出“制度一致性” (institutional

converger)。^① 本文利用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比较优势理论和政治学、社会学中的抗争理论，提出“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框架来分析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

在国际政治中，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都是理性的，都以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每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交往中都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可能表现为经济优势、政治优势、文化优势、军事优势、地理优势、资源优势和科技优势等。但是，比较优势并不一定能保证最大化国家利益，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比较优势对国家利益的贡献极其微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国际力量的分配不均会干扰比较优势的效用。因为大国尤其是强国或霸权国的存在，国际交往往往会被大国意志所左右。大国对国际交往的干扰会导致国际社会中利益分配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无法实现。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每个国家都有比较优势，但由于国际贸易的规则制定权在西方国家，美元是全球垄断型结算货币，西方国家会设置一些贸易壁垒等，导致很多国家在贸易领域失去了或者削弱了其比较优势。如果没有西方大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干扰，各个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均能受益，从而使帕累托最优得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每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以美国为例。1865年美国内战之后的比较优势是其资源优势（铁矿、煤矿、石油等）、原材料优势（棉花、小麦等）、地理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但时至今日，美国的资源优势和原材料优势早已不再，人力资源优势也处于下降趋势。目前，其在国际社会中最主要的比较优势是政治优势、军事优势、科技优势和金融优势。

综合实力孱弱的国家无论是闭关锁国还是对外开放，都具有比较优势。这是因为比较优势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但是，当该国刚刚从封闭走向国际社会的时候，其比较优势往往会被国际秩序所压制和干扰，这将导致该国的比较优势无法增进其国家利益。因此，这类国家会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对国际秩序产生怀疑和批评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批评和否定国际秩序不仅仅是出于国家情感的表达需要，更是一种理性的国家行为。因为只有通过抨击国际秩序，才能为改善自身地位和增强比较优势提供舆论基础。本文将弱国采取的这一行为和策略称为“弱者的武器”。这一概念最早系统地出现在詹

^① Edward S. Steinfi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 对东南亚农民与地主关系的研究中。^① 但是，这一概念也被国际关系学者广泛讨论和使用。例如，兰德尔·施韦勒和蒲晓宇曾借助这一概念来分析美国衰落背景下的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② 他们指出，除了一般性的抗争话语和行为，弱国还会进行日常抗争 (everyday resistance) 和合法抗争 (rightful resistance)。这些抗争的原则就是不通过暴力的形式与霸权国直接对抗，而是使用弱者的武器。^③ 通过这些抗争，弱国能够实现削弱霸权国的权威和国际秩序合法性的双重目标。

弱国不会永远是弱国，强国也不可能永远保持霸权地位。在强弱转化的过程中，国家的学习能力至关重要，它会帮助一国逐渐适应既有的国际秩序。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该国比较优势的显现，即从被抑制状态向发挥效用状态转变。而一旦比较优势得到发挥，该国的国家利益将得到保护和增强。这一过程可能会实现得比较快。例如，在过去短短的 30 年里，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就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没有人会相信 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会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事实上，中国目前的经济影响力甚至能够与美国相比拟。根据盖洛普 (Gallup) 的调查，在 2013 年，52%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只有 31%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才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④ 但是，比较优势从被抑制到发挥效用的转变过程也可能比较漫长。例如，美国在内战结束之后开始迅速崛起，其经济实力在 19 世纪末已经超越欧洲传统强国，成为世界第一。尽管美国也积极介入国际事务，施展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在成为头号经济强国五十多年之后，美国的政治优势才在国际秩序中得以体现和确认。当一国的比较优势能够在国际秩序下发挥效用时，该国自然会产生维持既有的国际秩序来进一步保证国家利益实现的动机。本文将一国依靠维持国际秩序来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和策略称为“强者的武器”。需要说明的是，使用强者的武器的国家，并不一定综合实力强大，而是只需在某一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并且这种比较优势被既有的国际秩序显现甚至放大。例如，日本在二

^① 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② Randall Schweller and Xiaoyu Pu,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 S. Decline”, pp. 41-72.

^③ Ibid., p. 49.

^④ <http://www.gallup.com/poll/167498/americans-view-china-mostly-unfavorably.aspx>.

战战败之后，受制于国内和平宪法的制约和美国军事占领的压制，并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如没有战争权等），也不是世界性综合实力大国。但在经济领域，日本具有明显的被国际秩序支持和放大的比较优势。因此，如果日本依靠世界经济规则和秩序（自由贸易、投资便利化、货币国际化等）来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就可以视为使用强者的武器。

最后一种行为和策略是“智者的武器”。从本质上讲，弱者的武器与强者的武器是相互冲突的。因为强者的武器是主张维持和强化当前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而弱者的武器则是希望能够削弱和调整当前的国际规则和秩序。智者的武器是对强者的武器的调整，它是指一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得到了发挥，国家利益得到了增强，但是仍然借助“受害者”的身份继续使用弱者的武器，即仍然坚持对国际秩序对己不利的部分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这一策略看似矛盾，实则理性。例如，在全球经济领域，美国、日本和中国都是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受益者，但它们的比较优势并不完全相同。美国作为受益者主要体现在其金融优势上，日本和中国则主要体现在其贸易优势上。但是，日本主要是高附加值贸易，而中国则是低附加值贸易。所以，中、美、日三国一方面都有支持当前世界经济秩序的动机，同时也有依靠修改国际规则和秩序削弱对手比较优势的动机。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国家就有可能使用智者的武器。一国选择使用智者的武器，目的是削弱其他在该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但是，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使用这一策略。只有能够建构出“受害者”的身份，才能成功地使用这一策略。“受害者”的身份可以多种多样，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遭受自然灾害、遭到不公平待遇、发生经济危机和历史问题等。

本文认为，“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刚刚打开国门之时，其比较优势（人口红利、资源优势、地理优势等）基本上处于被国际秩序抑制的状态。中国的政治制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被西方认可，经济上只能出口初级原材料和简单的加工贸易品，文化软实力更是无从谈起。因此，中国必然使用弱者的武器，批评国际秩序缺乏合法性。这种外交层面的反抗，不仅有利于增强国内的凝聚力，也有利于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变。但随着国家学习能力的提高，中国适应国际社会的步伐在加快。中国加入了大量的国际组织，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经济上实现了迅速腾飞。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使得其比较优势在更多领域得到体现，国际秩序

对中国比较优势的消极影响逐步减少。因此，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但是鉴于在诸如政治和军事等领域，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处于被国际秩序抑制的状态，中国会有选择地、部分地嵌入到当前的国际秩序之中，而不是全面地推进。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同，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这虽然是一个劣势，但也为中国择机使用智者的武器提供了回旋的余地。具体来看，1992～2001年间，中国在与国际社会互动时主要使用弱者的武器；2001～2008年间，中国在经济领域侧重于使用强者的武器，在其他领域则继续使用弱者的武器；2008年之后，中国开始在多个领域组合使用三种武器。这种策略的多样性反映出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同时，它也体现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日益成熟灵活。

1. 中国与国际秩序：1992～2001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沉重打击。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由此断言历史已经终结在自由民主。^①与此同时，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也在风起云涌。^②世界政治秩序迅速转向为维护和扩张西方的自由民主体系。在经济上，自里根—撒切尔经济改革以来，新自由主义迅速突破了美英两国的范围开始影响世界经济。这一时期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不足十年，并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来积极介入世界事务。在综合实力比较孱弱的情况下，中国只能在国际秩序中处于从属地位。经济上，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90年为3500亿美元，仅占美国GDP的6.21%，日本GDP的11.5%。在这一时期的国际经济分工中，中国主要以进口替代贸易和初级加工贸易为主。中国在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要素方面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些比较优势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所抑制的，而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则被扩大和显现。正因为如此，中国对世界经济秩序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对于90年代的世界经济形势，中国政府认为，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发展中国

^①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家的经济环境更加恶化，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① 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国同样不认可当时的国际秩序。例如，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却在 90 年代积极干涉别国内政；中国政府主张主权高于一切，但是西方国家认为人权高于主权；西方国家积极宣传和推行所谓的 R2P（国家保护责任）原则，并利用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插手他国事务。这些国际秩序安排都与中国的政治优势格格不入。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主要依靠弱者的武器。事实上，这是中国唯一可行的策略。中国使用弱者的武器的主要手段是日常抗争和合法抗争。日常抗争是指对国际秩序进行舆论批评，对美国霸权进行批判，对国际规则提出调整要求。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显示，中国认为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合理的。在日常的国内舆论宣传和报道中，无论是中央级的《人民日报》还是地方级的新闻媒体，都刊登文章批评当时的国际秩序。当外国领导人访华时，中国也会积极与其交流对国际秩序的看法。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积极进行合法抗争。联合国安理会中，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使用反对票最少的国家。但是在一些关键时刻，中国政府会不顾西方的阻力，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进行客观判断，投出自己的反对票。如在 1999 年，中国不顾美国等国家的反对，对马其顿共和国局势的相关决议投了反对票。

2. 中国与国际秩序：2001~2008 年

2002 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显示，中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这一转变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开始显现。2001 年，中国成功加入 WTO，从此，国际市场基本上对“中国制造”敞开了大门。2000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 5200 亿美元，仅占美国的 20.5%、日本的 55%。但是到了 2008 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了 2.8 万亿美元，占到了美国的 64%、日本的 160%。^② 从 1990 年到 2000 年的 10 年间，中国进出口总额只增长了 4000 亿美元；而加入 WTO 五年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就增长了 1 万亿美元；加入 WTO 十年后，增长了 3.7 万亿美元。资金不足是 90 年代中国经济的软肋。随着外汇储备的增长，这一问题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到 2006 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达到了 8500 亿美元，超过日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

②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

□ 当代亚太

本成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能力也在迅速提升。在军事和国防科技领域，中国在载人空间飞行（单人和多人）、探月工程、隐身战机、核武器研制、卫星导航、高速列车、超级计算机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包括海尔、联想、华为等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公司开始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多次在境外并购和建厂。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其他经济优势的释放。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下，享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国家往往能够抢占先机。2001~2008 年间，中国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开始显现出比较优势。这些比较优势与既有的经济优势（如劳动力、资源等）结合起来，进一步保证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国际政治秩序方面，西方国家继续依靠“人权高于主权论”来对中国事务进行干涉，“中国威胁论”也在这一期间广泛流行。中国所坚持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遭到西方国家的污蔑，这一点在 2008 年西方国家抵制北京奥运会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加入 WTO 给中国带来的改变，使得中国开始调整其与国际秩序的互动策略。中国在经济领域开始依靠强者的武器而不是弱者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表现在积极支持当时的国际经济秩序（主要是贸易秩序），并且通过运用国际规则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国积极利用 WTO 规则应对多次对华反倾销调查，支持各类企业“走出去”，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领域形成对比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国依然依靠弱者的武器与国际社会互动。在日常抗争和合法抗争方面，2001~2008 年间的情况与 20 世纪 90 年代并无很大区别。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显示，中国对国际政治秩序仍然持否定态度。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家学习能力在迅速提高。一国的学习能力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治精英的学习能力。2002 年 12 月 26 日，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一次集体学习。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在 2002~2008 年的 23 次学习中，涉及世界经济的有 13 次，涉及世界政治的有 3 次，涉及国际体系的有 2 次。上述三类性质的学习次数之和占政治局集体学习总次数的 78%。这些学习有助于中国最高领导层熟悉和运用国际规则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3. 中国与国际秩序：2008 年至今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普遍陷入经济衰退之中。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表现抢眼。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 GDP 增长率仍然保持了 8% 左右的水平。但是，中国政府认识到，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融为一体，如果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未来势必会影响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相互依存的理念出发，中国积极参与了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治理。在这一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积极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合作，共同支持全球经济早日走出衰退。^①中国虽然与其他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目标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显现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优势开始显现出来。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只有265亿美元；而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到559亿美元；到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接近1000亿美元。在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体系领域，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也在发生改变。中美国（G2）、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新理念的提出，表明中国在迅速成为多极体系中的重要一极，而不是普通一极。中国在政治领域的比较优势开始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下体现出来。

2008年之后，中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开始综合运用多种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经济领域，一方面，中国使用强者的武器，在贸易自由化方面维护国际贸易秩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中国也在使用智者的武器。中国认为，美元霸权会危害全球经济，自己也是美国输入型通胀的受害者，因此，尽管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撼动美元的霸权地位，但仍然积极谋求削弱美元，倡导储备货币多元化（具体措施包括改革IMF、推行SDR、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也在积极使用智者的武器与西方国家周旋。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政治比较优势开始从被抑制状态向显现状态转变。因此，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弱者的武器的使用，对国际政治秩序的态度也处于转变之中。但在某些问题上，当前的国际政治秩序仍然在抑制中国的政治比较优势，因此，中国还会坚持适度地使用弱者的武器。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日益加深，其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认同和支持当前的国际秩序。相反，中国采取了有选择的嵌入策略。这种策略的选择，受制于中国在

^① 更多关于中国与二十国集团关系的研究，参见 Gregory Chin, “The Emerging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G20: Reshaping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tudia Diplomatica*, Vol. LXIII, No. 2, 2010, pp. 105-123；杨洁勉：《二十国集团的转型选择和发展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11期，第50~60页；余永定：《崛起的中国与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5期，第9~12页；敖云波：《二十国集团的崛起与中国外交的对策》，载《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第122~126页。

国际社会中的比较优势与国际秩序的互动进程。当国际秩序抑制中国比较优势的发挥时，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会偏向去合法性；当国际秩序有利于中国比较优势的发挥时，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会转向嵌入。

五、结语

中国在 21 世纪的全面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崛起的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学术界均莫衷一是。本文从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出发，分析了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本文认为，对中国共产党党代会报告的话语分析，能够为理解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提供最为权威的解读。事实上，很多学者对中国外交和对外政策的研究，都以中国共产党为视角。^①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决定着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大政方针。

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使用话语分析和模糊集合分析来研究一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正在从全面去合法性向选择性嵌入的方向转变。其二，对于这种转变，本文提出“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框架来解释。这一理论框架，把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社会学中的抗争理论与国际政治理论结合起来。本文的分析路径不仅能够分析和解释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也适用于其他国家。例如，与中国一样，印度也是正在崛起的国家，话语分析和模糊集合分析同样适用于分析印度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本文提出的“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理论也适用于解释其他国家与国际秩序的互动结果。

^① 参见 Linda Jakobson and Dean Knox, “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 SIPRI Policy Paper No. 26, Sep. 2010; Jeremy Paltiel,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anada”, China Papers No. 8, Canadian International Council, March 2010; Clem Tisdell,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ness in China: China’s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the Last 30 Years”,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Vol. 39, No. 2, Sep. 2009, pp. 271-294; Bonnie Glaser and Evan Medeiros, “The Changing Ecology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in China: The Ascension and Demise of the Theory of ‘Peaceful Rise’”,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2007, pp. 291-310.